

大明帝国

The Great Ming Empire I

Peculiar Found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Volum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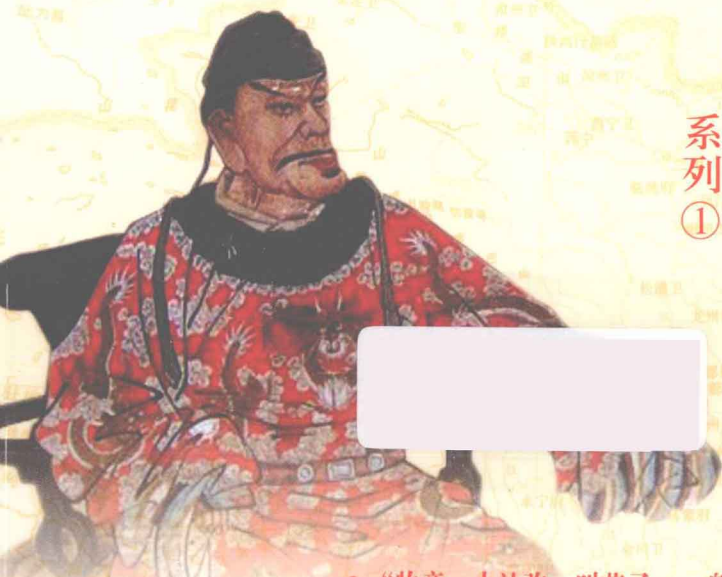
洪武帝卷

上

系列 ①

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
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多任嘉宾
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特邀嘉宾
南京电视台「金陵往事」首位主讲人
南京市文化品牌「市民学堂」常任主讲人
江苏教育电视台「城市传奇」常任嘉宾
江苏省文化品牌「江苏人文讲堂」主讲人
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旧闻新说」常任嘉宾
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常任主讲人
美国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主讲人

马渭源 著 Ma Wei yuan



- “牧童→小沙弥→叫花子……皇帝，朱元璋创造人生奇迹
- 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事：郭美眉自己送上门？
- 洪武朝规定：若官员家属犯罪，该官员必须辞职！
- 洪武帝终于意识到：官员靠荐举，就会形成老鼠窝
- “富二代”炫富，朱元璋下令：让他们到苏北去当马倌！
- 朱元璋严刑酷法惩治贪腐，创造中国反腐史之巅峰



东南大学出版社

大明帝国

系列①

The Great Ming Empire I

洪武帝卷①

Peculiar Found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Volume 1)

马渭源 著

Ma Weiyuan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帝国. 洪武帝卷: 全 3 册/马渭源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641 - 4585 - 9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②朱元璋(1328~1398)—传记 IV. ①K248.09
②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6026 号

洪武帝卷①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 21009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谷 宁 马 伟

电子邮箱: editor_ma@163.com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40.25

字 数: 1154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1 - 4585 - 9

定 价: 89.00 元(上、中、下)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序

马渭源教授的最新著作《大明帝国》系列①②③《洪武帝卷》上、中、下三册要出版了，邀我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了。因为他与日本关西学院校长、国际明史专家阪仓笃秀教授是老一辈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的第二代传人，这是2011年底海内外眉师儿孙们云集一堂，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作出的慎重决定。作为眉师的第一代传人，我感到责无旁贷要做好这件事情。

马教授去年应邀去美国做讲座，北美三大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对此都曾做了专门的报道，其中《世界日报》称誉马渭源教授为著名的明史专家；稍后中国大陆媒体称他为“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另据海外媒体所载，马渭源教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系列专著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西方诸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真乃可喜可贺！最近中央级大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说：“世界上SCI检索影响力较大的2000种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5种；排在本学科前3位的世界顶级期刊中，没有一本中国期刊。”（《光明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7版“科教文新闻”）与此相类或者说更不尽人意的是，中国虽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出版大国，但中国出版的各类专著为西方国家收藏的却不到20%，社科类不到10%，历史类更是凤毛麟角。而马教授的著作能被这么多的西方著名高等学府所珍藏，真是不易！其实这些年在国内马渭源教授早已是南京电视台、南京广电、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福建网站等公共媒体上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讲座主讲人和电视节目的常任嘉宾，而他的著作则更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据说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举办他的签名售书活动，原定活动时间为半小时，结果因为读者太多了，主办方不得不延长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未能满足广

大读者的需求。而最近又传来好消息，国内外有名的网络运营商如亚马逊、中国移动、中国苏宁等都与马教授签订了电子书出版合同，人们尤其年轻的读者只要按按手机上的键钮就能轻松阅读他的电子版著作。

一个学者能将历史研究学问做到这样，实属不易。在我看来，马教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和拥有这样的影响力，其原因恐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其他几卷已经有序，以下说事就以本次出版的《洪武帝卷》为例）：

第一，深度探索，还原历史

目前为止，有关洪武帝朱元璋的传记有好几个本子。最早的可能要数吴晗先生的《由僧钵到皇帝》，那是民国三十三年十月由在创出版社出版，当年我在书店里买到了就读。五六十年代吴晗先生对原书进行反复修改，后出版了《朱元璋传》（三联书店版）。据说当时有好多政治人物都读过，但毕竟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里边有不少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特定意识形态的标签，今天年轻人读来可能有种隔世的感觉。后来陈梧桐教授和吕景林教授也分别写了有关朱元璋的传记，如今书店里可能还能买到。

马渭源教授在 2007 年时就撰写了《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上、下册，尽管该书在 2008 年 1 月出版后很受读者喜爱，发行量也急剧攀升，且远销海内外，但马教授对自己的著作却很不满意，多次在我面前说，那是电视节目的讲稿，时间太仓促，很不成熟，遗憾多多。为此，这些年他不断地收集和整理史料，打算重写。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放在我案头的是 100 多万字的巨著，比原书稿整整多出了一倍。这是量，现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浮躁，特别讲究量。不过在我看来更应该讲究的是质，我曾几次跟马教授说：搞史学研究我们要么不写，要写就一定得有所突破。通览现在的《洪武帝卷》3 册，我发现：马教授书稿中起码有 70% 是前人所未曾阐发的。譬如：第 1 章“地狱草根，绝处逢生”、第 4 章“建都南京，开创大明”、第 5 章“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第 6 章“立纲陈纪，关注民生”、第 8 章“洪武‘四清’，八场风暴”、第 9 章“思想一统，科举‘隽永’”和第 10 章“千秋过功，治隆唐宋”。而在这 7 章中让我觉得最为出彩的甚至可以说拍案叫绝的是第 5 章和第 8 章。

第5章“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主要是讲朱元璋君臣的统一运动，即南征与北伐等“多管齐下”。而北伐后明朝有着相当一段时间与北元军进行斗智斗勇算什么？也称北伐？似乎历史上还没这么个说法，还有双方交锋了多少次？结果如何？过去人们往往泛泛而谈，谁也没有说清楚。马教授从《明太祖实录》、《皇明诏令》等明代文献资料入手，深度考察了洪武年间大明与北元之间的历次战争，发现当年有过一个比较固定的说法，叫“清沙漠”。其首次出现在洪武四年朱元璋诏令里头：“朕起农业……重荷上天眷佑，平群雄，一天下，东际辽海，南定诸番，西控戎夷，北清沙漠”（《明太祖实录》卷65），以后经常使用“永清沙漠”（《明太祖实录》卷71）、“肃清沙漠”（《明太祖实录》卷185）、“扫清沙漠”（《明太祖实录》卷226）等。因此说使用“清沙漠”一词最能概括当时的那段历史，还原于历史本来面目。随后马教授又将他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做了提炼，制成《明初洪武年间大明帝国10次清沙漠情况简表》，让人一目了然，有利于了解明初朱元璋确立重点打击“北虏”之国策的正确性和大一统帝国再造的艰巨性，弄清了明太祖与明成祖在北疆问题策略上的优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小朱皇帝比起老子来要差多了，绝非如《明太宗实录》等当年官史所吹嘘的那般。这样一来，将一部真实的明朝开国统一史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

本章另一大突破就是高度颂扬洪武年间的统一运动，将朱元璋领导汉民族为主体的推翻异族统治与“恢复中华”正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视为洪武朝立纲陈纪等建国纲领内涵的重中之重，这无疑是将明史研究深化了。昔日论及明初开国、北伐与推翻元朝统治往往泛泛而谈，或用红巾军为主干的农民阶级起义推翻以元顺帝为首的元朝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来说事，不是给人隔世的感觉，就是让人难以领悟到当年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与建国纲领的真正含义，更无法理解500年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P94，P170）的革命纲领为什么与朱元璋政治主张有着诸多契合之妙了。

马渭源教授在书中首先指出：朱元璋的那16字北伐与建国纲

领充满了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自信。随即他强调：这里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要加引号，那是指的历史概念，不应该与现代意义上的“大中华”概念完全画上等号。“古代的‘中华’概念可能更多指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明，‘中华’后面当时可能没有直接加上‘民族’两字——那是近代的概念，但并不等于说当时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作为民族之林中的老大哥汉民族由于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拥有一定的自傲感也没什么过错啊，更何况在汉民族建立的历代帝国政权中少有或几乎没有过分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残暴统治，倒是文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一旦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不遗余力地推行愚昧又落后的民族压迫政策，元蒙是如此，后来的清朝也是如此”。接着他就解释了朱元璋16字纲领的涵义。

第一层涵义即前面四字“驱逐胡虏”，就是要推翻蒙古人为主体的元朝统治。说到这事，我们社会中一直有着动机不良的“老左分子”，他们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其实“胡虏”这个称呼首先是个历史概念，既然现在说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说历史概念呢？再说作为民族的加害者当年的蒙古统治者和后来的满族统治者，曾疯狂地屠杀我们汉族同胞，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甚至摧毁我们汉民族传统与自尊，如蒙古人霸占江南姑娘的初夜权、满族人实施“留发不留头”和“留头不留发”……如此暴行好像都被当今某些人给忽略不计了，反而在媒体上还大谈异族入侵和民族屠杀是如何的“历史进步”，怎么啦？某些人得了“猥亵症”抑或失忆症？再来看600多年前的蒙古人是如何地肆意凌辱汉民族的，进而激发和唤醒了当时最为低等的“南人”和“汉人”的民族斗志与民族自信。随后马教授列举了元朝人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西僧嗣古妙高等人“尽发宋（帝）诸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窃其宝玉无算”（【明】戴冠：《濯缨亭笔记》卷1；《明太祖实录》卷53），且将宋朝皇帝头颅割下来当做饮器（一说被当做溺器）。而后他指出：在传统社会里，汉族皇帝就是汉族人的“大父亲”、“老祖宗”，连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还要受到如等奇耻大辱，这样的汉民族情感伤痛恐怕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说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口号，至少说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受压迫民族当中具有

极大的战斗号召力,或者说引发巨大的共鸣,也为汉民族找回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朱元璋无疑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马教授说得合情合理,令人拍案称绝。

第二层涵义为“恢复中华”。这里边不仅仅包括了要恢复汉民族统治,要重建传统帝国王朝,而是还隐含着要恢复元朝以前的中华传统文明,洗涤元蒙“胡俗陋习”,“参酌唐宋之制而定之”(《明太祖实录》卷36)。唐、宋是中华古典文明发展史上的经典时代,尤其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几项十分显著的“文明标杆”——“四大发明”都是在唐、宋时代完成的,而随后的蒙元时代绝对称不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多大的积极贡献,恰恰相反,它的“横加插入”倒是使得传统文明遭受了突然打断,甚至是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严重摧毁:废长立幼,以臣弑君,以弟酖兄,弟收兄妻,子烝父妾,……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之至!(《明太祖实录》卷26)因此说朱元璋的“恢复中华”绝对称得上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决不能低估。

第三层涵义为恢复汉民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统治秩序,实行帝国内各民族基本平等。朱元璋明确宣布,对于少数民族“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明太祖实录》卷26),这就是告诉人们:我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绝不会像元朝人那样搞什么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要知道在遭受异族入侵、饱受异族歧视与压迫长达一百年的情势下,提出这样的民族平等口号与施政精神,这需要何等之勇气和度量!

第四层涵义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主要表明朱元璋在即将开创的大明帝国中要以中华传统为模板,建章立制,将蒙元“冠履倒置”的给重新摆正,恢复我们中华传统的典章礼仪与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将水深火热中的元帝国子民给解救出来,即“拯生民于塗炭,复汉官之威仪”。以这样的口号来吸引和激发深受元朝黑暗统治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斗志和信心,由此说来,这八字也是与当时的北伐直接相关联的。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肯定,朱元璋当年发布的这个“北伐宣言”是很了不得的新帝国施政大纲。

通过以上论述,马教授抓住了历史时势的本质,运用了当时人们所用的术语,客观地还原了当年真实的历史境遇,说事透彻,鞭

辟入里，有理有节，读来令人震耳发聩。这样的深度探索是至今为止明史研究中所从未有过的，这难道不是他的一大贡献！

而第8章中的出彩点就更多了。大凡学过明史的人都知道，洪武年间政治严酷，大案连连，“运动”一场接一场。那么朱元璋到底搞了多少场“运动”呢？其真相又到底如何呢？至今为止从来就没人说清楚过。

马教授从研读清朝学者历经百年修订的《明史》和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入手，比对《明实录》，以此作为基础，再参用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国榷》和明代文人笔记史料，尤其重视对洪武年间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大风暴”的部分“实录”——朱元璋御制《大诰》系列的深度挖掘，从中发现：整个洪武31年间，除了北伐、“清沙漠”行动和立纲陈纪或言立法定制，加强极权君主专制外，朱元璋至少还发动了8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或“大风暴”，即洪武四年录（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或九年清查空印案，洪武十三年起连坐“胡党”，洪武十八年起追查郭桓案，洪武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十九年前后清除社会惰民逸夫，洪武二十三年罪妄言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开始的深究“蓝党”……这是何等严酷的政治啊！马教授一下子抓到了“洪武”的主题涵义，“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随之展开一一考证和论述。如此深入系统研究在明史学术领域里还从来没有过，这又不能不说是马教授的一大学术贡献！

第二，正确把握，正说历史。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野，通过无数的杀戮而登上了大明帝国的权力顶峰，那么这中间有着怎样的经历让一个游方僧人、叫花子最终取得了成功？过去我们很多人纠缠于朱元璋是不是反元农民起义英雄，进而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认为通过武装斗争的就是正义的化身，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朱元璋能成功登上帝国权力顶峰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洪武帝卷》的第2章“龙飞淮甸，发威应天”和第3章“先陈后张，统一南方”起，一直到第4章“建都南京，开创大明”和第5章“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马教授在考证了大量的史实依据基础上，重塑了一个真实可近的朱元璋。他首先敏锐地观察到朱元璋与历代君临天下的权威高势能者获取成功的第一大秘笈——掌握与利

用好军事武装力量：自经略定远那刻起，朱元璋就为自己偷偷地留了一条后路，在扩充所谓的郭子兴起义军时也暗暗地为自己培植了势力，像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邵荣、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的投奔对后来朱元璋势力的稳固与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叙述完经略定远后，马教授笔锋一转，论述起滁州、和州根据地的开辟，巧妙地结合朱元璋人生早期非同寻常的8年经历，凸显了他的老辣——乘着老丈人郭子兴与众大王内讧之际，拉大旗作虎皮，拼命发展自己势力。如此这般，等到郭子兴病亡之时，他已经实际上控制了这支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忽悠”且掌控巢湖水师，并以此渡长江、攻太平、战集庆。面对这样的态势，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郭氏旧部和郭家兄弟俩郭天叙、郭天爵，这才有了进攻集庆时张天祐和郭天叙舅甥俩合力争抢攻城头功的一幕。而从实际角度来看，当时形势明摆着，郭子兴时代已经过去，其结果不言而喻。

利用了老丈人的平台、发展了自己，娶了人家的养女、又心安理得地占有恩人家的宝贝千金即后来的郭惠妃（《明太祖实录》卷2），随后处死了“谋反”的小舅子郭天爵，加上治军治政中的某些失措和自身性格缺陷——偏执型，这一系列负面因素慢慢地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了挫败陈友谅进攻——应天大捷后的蒋英、刘震、贺仁德、李佑之、邵荣、谢再兴等一系列叛乱。好在那时的朱元璋知错就改，且及时全力补救，这才终未酿成大祸。

马教授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脉络，既阐发了前人所未发的——如三攻集庆的惊人内幕，但又十分谨慎地叙述历史、正说历史——他对张天祐和郭天叙舅甥进攻集庆城时的“巧死”是看透了，可又不武断地下定论或戏说，这无疑与吾师黄先生著述《明史考证》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朱元璋成功史的这样撰写与叙述比起过去一味唱赞歌不仅显得水平要高超，认识要深刻，而且历史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还有朱元璋冒险援救小明王与攻打并无多大利害关系的庐州之失策，马教授通过对这一系列朱元璋开国过程中的失当举措的客观描述，使得朱元璋形象既不神圣化，也不妖魔化，而是更加真实，有血有肉。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许多多。

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军纪严

明，法不分亲疏；早期军事战斗中常常能亲自带头去啃硬骨头，譬如收编驴牌寨、攻打宁国和浙东婺州、血战鄱阳湖、亲征大汉国等；利用小明王政权的反元大旗，高筑墙、缓称王，尽可能减少受人攻击的目标；礼贤下士，广辟人才；建立稳固的江南地区起义政权，等等。不过在这过程中还有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朱元璋从建立江南地方政权那刻起就极为注意经济恢复和经济制度重建。在第6章“立纲陈纪，关注民生”中，马教授分别从朱元璋政权的屯田制、开中法、黄册制、鱼鳞册制、三等九户徭役金派制度等这些过去人们研究不太经意的经济制度入手，逐一考察了它们的历史流变，并一语中的地指出：如些经济制度所贯彻的核心精神为“右贫抑富”（《明史·食货志一》卷77）。朱元璋这等做法可谓一箭数雕，既解决与稳固了自身政权的经济基础，又缓解了当年紧张的社会矛盾，打抑了地方上的豪强富民，强化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洪武皇帝本人来自草野，深知权力的魔力与民生之不易，因此明初新帝国天子不断地发出“最高指示”，构建“政治绿色通道”，鼓励老百姓造贪官污吏的反，营造“宽民”环境；建立养济院、漏泽园和预备仓制等，构建常规性救济通道，对弱势群体实施有效救济；政治上管教官吏爱民，营造关心农民疾苦的氛围。如些举措彰显了一代开国君主的平民情结，这大概也是数年前马教授在出版朱元璋传记时冠其书名为“奇特的开国皇帝”一大原因吧。虽然在这次出版中，可能是为了系列丛书的格调统一，他将书名做了修改，但这些独特的精彩叙述却依然保留了下来，让人读来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将洪武朝治政定格在“平民情结”，再看朱元璋参酌唐宋，损益元制，立纲陈纪，构建新体，精制狠招，直指“三农”，四副“猛药”，力解顽疾，以良治良，首创粮长，构建农村自治，建立公平有序的工商秩序，崇本抑末……不难看出，朱元璋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在试图实现他童年的那个梦想——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保护弱势群体、宽待民生，或言“使厚民生”（《明太祖实录》卷40）。因此人们不难看到：尽管洪武年间运动不断、大案要案迭出，官员成批受惩、知识分子遭清洗，功臣勋旧被杀戮殆尽，但大明帝国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因为占据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与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活还过

得去。让人十分惊叹的是，马教授在书中根据《明实录》、《明史》等正史史料精心制作了《洪武时期主要几次大规模移民简表》、《洪武时期修筑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与水利设施简表》、《洪武时期每年新增垦田亩数》、《洪武时期天下官民田增长数据与增长率》、《洪武时期与元朝岁征粮食数据比较表》、《洪武时期与元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数据比较表》等数十张表格，这不仅反映出他读书之精细，论述之谨慎，史论之严肃与客观——全面正确地把握好了洪武朝的历史实际，而且还颇有创见，说理透彻，甚至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第三，通俗易懂，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由于年代的变迁，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曾经很时髦，但今人或许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还有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着特定的背景，倘若一般人去阅读当年的史料记载或许会感到困难，这就要求当代历史研究者在探寻真相基础上用现代语言将其叙述好。当今历史类的作品不是没有，前些年清宫戏盛行，连有些人的称呼也跟着变了，小女孩叫“格格”，父亲叫“皇阿玛”。我们汉族人自古有自己的礼俗，何必要去抢其他民族的“风头”？还有那书摊上俯拾皆是《××那些事》、《权力野兽××皇帝》，网络上流行“关公战秦琼”一类的穿越小说，等等。在这等历史类题材作品中，编剧与作者要么将昔日杀人如麻的专制君主个个都变成了柔情似水和爱民如子的“仁君圣人”，要么变成坏得不能再坏的历史垃圾。更有一些所谓的研究专家，要么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历史在其嘴里真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女孩。甚至还有人将街头巷尾的民间传说直接串成了“论文”，里边连一个史料引证和考据都没有，据说不仅能在某个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为论文宣读，而且还为某学会某会长所津津乐道——相互吹着捧着混饭，想来就不得不让有良知的人为其感到脸红。

我一直认为：历史研究与著述应该十分严谨，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绝不能一拍脑袋来个胡说和戏说。这是历史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作为历史题材作品就应该有一种时代的责任，应该给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一种真实的、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文化道德正能量。

四五十年前吾师云眉先生就是秉着时不待人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文化道德正能量，专心致志地从事《明史》考证这项巨型工程。按照眉师的心愿，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修《明史》。然天不假年，先生终未全部如愿。当我接到整理先生遗稿、继承先生未竟之业的通知时，顿感身上有千钧之重。阴差阳错的是等我整理工作干得差不多时，又受命从事行政工作。幸好现在先生的第二代传人马渭源教授实际上已经接过了此项重任。由此，我感到万分的欣慰。

马教授历史专业研究生出身，20多年前的研究生可不像现在只学两年左右甚至更少，至少得学三年，因此其专业功底扎实，既熟悉古代史，又通晓古代汉语。这还是基础的基础，关键在于在研读的基础上进行考疑，去伪存真。马教授曾多次跟我说：他每用一段史料都要翻翻黄先生的《明史考证》，以此作为指南，研究起来就方便多了。当然接下来的撰述也极为重要，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节奏的加快，大多数普通人已不可能去攻读那看似“天书”一般的古文了，这就要求我们史学研究者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研究成果流畅地表达出来，但绝不是戏说。通读马教授100万字的文章，发现其内既故事连连，扣人心弦，又有张有弛，收放有度，说理到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且文笔优美，寓意深刻，读后令人深思。

例如第9章“思想一统，科举‘雋永’”。整个章节几乎都是全新的，以往有人在撰写朱元璋传记或明朝开国史时要么根本不提这类内容，要么说了也是三言两语或一鳞半爪。据我所知，马教授在本世纪开启之际就开始研究中国科举制——那时全国几乎很少有人进行此类研究。他曾跟我说：“朱元璋这个人平民出身，不同于一般的皇帝，他始终有着‘公平化’的平民情结。”在书中，马教授首先从洪武帝对科举改革的标准化入手，指出朱元璋搞科举考试标准化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了达到公平化的一种手段。“从朱元璋内心角度而言，搞标准化科举考试，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童年起朦胧形成的‘公平化’社会秩序之理想。而要使科举制公平化，除了运用标准化作为一根标尺来衡量外，很重要的还是要完善科举制度，将以往不合理的制度成分剔除出去，增添更为合理的规章与措施，这就是朱元璋对科举改革的核心灵魂所在的一个方面，

即‘制度公正化’和‘程序公平化’。”在这两者之间，马教授巧妙地插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时代——唐宋科举文化的十大珍贵遗产和朱元璋君臣的取舍。这样一来，不仅使得读者对中国科举制的发展脉络大致有了了解，明白中国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为公平化、平等化——这恰恰是后来西方国家模仿中国科举考试推行文官制的精神动力所向，可惜的是我们的科举到了后来清末时来了个“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扔了”。于此马教授颇为诙谐又不无痛心地写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大清帝国宣布废除中国沿用了1500多年的科举制时，西方欧美国家却争先恐后地学习和模仿中国科举文官考试制，建立起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完善近代西方政治文明。东西方如等巨大的反差，让人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东边日出西边雨’，不，应该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喜乎？悲乎？”

能拥有这样的思想深度和锐利眼光就充分表明了撰述者已非仅仅是一个历史学者，更是个有着相当睿智的思想家与高度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文化研究专家。读了这样的著作，难道不觉得有一种对正义和真理之追求的责任感与正能量的积聚？

更妙的是马教授在书中，将一个个历史名词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譬如明代科举制中有四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些名词现在一般人见了都会感觉陌生，如何解释好呢？马教授说，童试就是乡试前的资格考试；乡试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考试，考中者即举人，在学历上相当于今天的本科学历，在学位方面就相当于学士学位；会试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考试，考中者即贡士，在学历上相当于今天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在学位方面就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等等。读来通俗易懂，但又不低俗。让人在轻松中阅读历史，看来他是吃透了历史文化才会这般轻车熟路、信手拈来。

2007年马教授就应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市民学堂”之邀主讲过“中国科举制”，据说当时人民大会堂场上爆满、楼上楼下都是听众与媒体记者，原定两小时半的讲座因为讲得太生动了而被迫延长。随后马教授的讲座内容被《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等众多平面媒体和各大网站所转载和援引。从去

年起，马教授又屡次受邀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广电集团开办的新版“市民学堂”，全天候主讲《大明帝国之风云》系列。据说仅今年一年内他就讲了五六次，是该栏目出境率和“回头率”最高的主讲人。通过多频道的广播电台、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马教授的历史文化讲座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甚至还“走进”了“流动的小屋”——汽车。由此人们称他为大众历史学家，我看差不多，但最好要加个定语，应该为“不低俗和有责任感的大众历史学家”。

第四，开拓“荒地”，全面客观。

明史研究很奇怪，从明清至今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按理说相对“拓荒”专业领域会少一点，可事实恰恰相反。譬如明朝定都优劣之讨论，最早可能是由明朝中期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开启其端，不过遗憾的是他也仅仅点到为止。那么大明到底定都南京还是定都北京好呢？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困，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

黄宗羲说的都是事实，可惜的是这位大思想家之后却几乎无人进行详实的研究与阐述，即使有论者在讲述明朝开国史时不得不提到这个问题，但也往往罗列出一大堆定都南京的不是，而实际情况真是这样？恐怕问题没那么简单。

有幸的是，马渭源教授专门辟出一章即第4章“建都南京，开创大明”，在进行一一深度考察和指出定都南京之弊后，他又十分辩证地肯定了它的可取之处，并详尽地阐发了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重大意义：①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创立了历史先例。②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解决了南粮北运带来的许多劳民苦众的社会大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争”之先河。③奠定了南京60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提升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

位甚至国际名望。④基本确立了南京南北混合的地域文化风格（详见本书第4章）。

如此广角视野下的探讨与论述在以往明史研究中还从来没有过。据我所知早在七八年前马教授就大明帝国定都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专门研究。可能也是从那时开始他不断地受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文讲坛”、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南京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福建网站等机构与单位，主讲“大明王朝在南京”、“大明风云人物”等系列历史讲座。他的讲座论文《大明帝国与古都南京》曾被江苏省委党报《新华日报》和南京市委党报《南京日报》等权威报刊全文刊载，如今在网上还广为人们所引用。据说这些年北京、四川、陕西、湖北、河北、山东、广东等省份还将马教授的史论当作高考历史素材题。原本一笔带过的明史研究“荒地”经由他的研究与深度拓荒如今已变成了妇孺皆知的“熟地”，由此可见其影响是何等之广泛！

除了上述章节外，《洪武帝卷》的第7章“躬自庶政，高度专制”，虽说是马教授为了照顾一般读者而作了通史性的叙述，但他处理得不错。实际上这类典章制度的研究与论述很不容易，也很难说得明明白白。数年前阪仓笃秀教授来宁，我就跟他讲起：明代政治类典章制度向来涉足者甚少，是明史研究的一大薄弱环节。他回国后花了数年的心血，终成《明王朝中央统治机构之研究》。马渭源教授尽管未作这方面的专论著作，但他在这部《大明帝国·洪武帝卷》的鸿篇巨著中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通过讲述一个个惊心动魄又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分别从朱元璋“废除地方行中书省，实行‘三司分立制衡’；废除中书省宰相制，相权六分君主统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兵权三立’君操军伍；精筑五道监察大堤，分权制衡确保君体；制定‘公务员’标准化，严惩官吏贪暴腐化；专制渗透穷乡僻壤，四处布下天罗地网；《大明律》与《大诰》并行，礼法结合屈法伸情；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特务统治无处没有；君主淫威无限张扬，时常当殿滥施廷杖”等九个方面详细考察明初政治制度的“前世”与“今生”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大大深化该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带有极大的开拓性。

譬如讲到朱元璋“制定‘公务员’标准化，严惩官吏贪暴腐化”

那一节，马教授在充分注意明朝领导干部入口处的七种回避制度，即官员资格标准化、大明“公务员”工作规范化与公务标准化的同时，对当时“公务员”公款吃喝规范化、标准化——明赐公宴节钱，地方“公务员”朝觐费用补贴规范化、标准化，官吏 8 小时以外的行为规范化——尤其对官员嫖娼宿妓的处罚，大明“公务员”工作检查、考核标准化——考察与考满，以及大明“公务员”物质生活待遇规范化、标准化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并予以浓墨重彩的描述，开拓性研究了明朝“公务员”等级工资配套化及其生活住房配套化、标准化，首次在学术界提出了明代官员样板房问题——事实上是文官制下的“官邸制”，他不仅从正史中找到了历史依据：“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朔，（朱元璋）命工部增造京官居舍。时京官员多有与民杂处者，礼部主客郎中曾伯机以为言。上命增造房舍凡百余所”（《明太祖实录》卷 172）；《明史》中则说得更为详细：“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明史·食货志五·商税》卷 81），而且还从明代文人笔记中找到补充与注解：“太祖南都建文官开济等宅，甚宏丽，因呼为样房，至今犹呼品官房”（【明】皇甫录：《皇明纪略》；【明】叶盛：《水东日记·洪武大臣赐第》卷 6）。最终他这样写道：从“至今犹呼品官房”几个字来看，大约到明中叶时，大明帝国品级官员中似乎依然实行国家住房配给制。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朝“公务员”尽管实行底薪制，但他们的实际生活还是有所保障的，这也可能就是当年朱元璋反腐倡廉、严格要求大明“公务员”言行标准化的一大充足理由吧！（详见第 7 章）说理透彻，有根有据，既开拓了明史研究的“荒地”，又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洪武朝治政严厉的合理内核。由此可见马教授的见解确实不一般！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五，一部传记，一部信史。

历史应该是过去发生事情的真实记载，在相当程度上就应该是“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该是历史上发生之事的真实的记录。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不都是真正的历史，“实录”也不可能是当时所发生之事的真实记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的当朝人随意解释的历史，或者说是任意打扮的小女孩了。因此对于我们后世历史研究者来说那就意